



● 作者/Stephen M. Walt ● 譯者/李育慈 ● 審者/劉宗翰

伊斯蘭國的本質及因應之道

ISIS as Revolutionary State: New Twist on an Old Story

取材/2015年11-12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2015)

伊斯蘭國雖然透過社群媒體吸引海外的聖戰士加入，在各地發動孤狼式恐怖攻擊，但其意識形態過於狹隘，實力仍難以擴張其勢力範圍。最佳因應之道是採耐心圍堵策略，有效利用在地行為者的力量。

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的所作所為，已引起世界各國聯合發動武力制裁。

(Source: REUTERS/達志)



對許多目睹伊斯蘭國之暴行與宗教激進主義行為的人而言，這個組織似乎特別棘手且異常危險。根據其領導人的言論，該組織致力消滅異教徒，在世界各地厲行伊斯蘭教律法，加速先知穆罕默德重返。伊斯蘭國士兵以驚人的暴行追求這些目標。惟與其前身蓋達組織(al Qaeda)不同的是，前者對控管領土興趣缺缺，但伊斯蘭國卻試圖在佔領區內建立國家雛形，其已明確劃定領土疆界、建立賦稅與教育制度，以及複雜精密的宣傳運作。伊斯蘭國自詡為「哈里發」(caliphate，譯註：先知的代理人)，抵制以國家為基礎的當前國際體系，只有其領導班子統領的疆域才是國家。誠如德國記者托登賀佛(Jurgen Todenhofer)曾到訪伊斯蘭國控管下的伊拉克與敘利亞領土，其在2014年曾表示，「外界必須了解，伊斯蘭國現已是個國家。」

然而，伊斯蘭國稱不上是第一個整合暴力傾向、華而不實野心，以及領土控管的極端主義運動。儘管具有宗教向度，該組織僅是一長串革命建國組織

的晚近崛起者，在許多方面和法國、俄羅斯、中共、古巴、柬埔寨及伊朗革命期間興起的政權極其相似。這些運動對現行國際規範抱持敵意與伊斯蘭國如出一轍，且亦使用殘酷的暴力手段消滅或脅迫敵人，向更廣闊的世界展示其力量。

當我們研析現今的伊斯蘭國時，參酌這些先例令人感到心安。因為只有強權才有能力散播革命的信條是被證實的，故唯有在強權涉及革命時，方能構成嚴重危險。伊斯蘭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強權，況且，即使其能吸引世界各地若干的支持者，其意識形態還是過於狹隘，實力仍不足以接管伊拉克和敘利亞以外地區。

從歷史教訓亦可得知，外力欲藉由強化右派的立場，並提供額外擴張的機會來推翻革命國家，往往會玩火自焚。目前歐巴馬政府「削弱並最終瓦解」伊斯蘭國的政策，反而可能提高伊斯蘭國的威望，強化西方對伊斯蘭抱持敵意的言論，並鞏固其成為伊斯蘭世界最堅定捍衛者的主張。較佳的因應之道取決於在地行為者耐心地圍堵

該組織，美國則退居幕後。欲採取這種途徑需要正確看待伊斯蘭國：它是資源不足的小型革命運動，除了使其控管下的不幸百姓水深火熱之外，其勢力不足以構成重大的安全威脅。

當極端分子奪權時

革命意謂抱持不同政治理念的新政權取代既有政權。這些動亂通常由先鋒政黨或叛亂團體領導，諸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s)、中國共產黨、柬埔寨紅色高棉組織(Khmer Rouge)或伊朗柯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及其追隨者等。革命運動有時自行推翻政權，有時則是利用舊秩序因其他原因瓦解後，所產生的權力真空時機。

由於革命是險阻重重的暴力鬥爭，故革命領導者需要大量好運，俾推翻政權，鞏固渠等後續控制。他們亦需說服支持者甘冒巨大風險捨身取義、壯烈成仁。革命運動的特色是結合勸誘、恫嚇、教化，以強迫服從，鼓勵犧牲，正如同伊斯蘭國當前之所作所為。尤為甚者，他們大量灌輸旨在合理化極端手



伊斯蘭國領導人巴格達迪抱持革命勝利終將來臨的信念，灌輸其下的支持者忠貞不二。(Source: AP/達志)

段，使追隨者相信犧牲可獲得果實的意識形態。這些信條內容雖不盡相同，卻不約而同在說服追隨者，推翻既有秩序是必要的，他們的付出終將成功；典型的革命意識形態有下列三種實踐方式。

首先，革命組織將敵人描繪成邪惡、心存敵意、無法改革，因此不可能妥協，這意謂舊秩序必須連根拔除、取而代之。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者主張歐洲君主政體無可救藥地腐敗與不公，並以此合理化國內激進革命手段，這使法國和歐洲其

他國家的戰爭幾乎難以避免。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堅稱，唯有澈底革命才能剷除資本主義的固有邪惡根源。毛澤東則告訴其追隨者，「帝國主義者永遠不會放下屠刀。」柯梅尼對伊朗國王亦抱持類似看法，要求追隨者「掐住其脖子直到斷氣為止。」

伊斯蘭國如出一轍。其領導人與意識形態將西方描述成懷著固有敵意，而當前的阿拉伯與穆斯林政府則被視為與伊斯蘭本質相反的異端。與這些異教徒和叛教者妥協是毫無意義的，必須加以

消滅，改由遵從伊斯蘭國認可之伊斯蘭教義的領導人取而代之。

第二，革命組織宣稱勝利必將到來，以使支持者忠貞不二。列寧主張資本主義必因自身的矛盾而失敗，毛澤東則將帝國主義視為「紙老虎」，兩者藉此向追隨者擔保革命終將成功。2014年11月，伊斯蘭國現任領袖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提出類似的樂觀宣言，他向聽眾宣稱，「國家事事太平，欣欣向榮。它將自強不息，繼續前進。」

第三，革命運動領導人通常自認其模式是舉世通用的。他們向追隨者保證，一旦革命成功，便可解放廣大群眾，建立更理想的世界，或實現某些神聖的教義。1790年代的法國激進分子以「追求普世自由的聖戰」為名；馬列主義則相信世界革命可催生無階級、無國界的和平國度。同樣地，柯梅尼及其追隨者將伊朗革命視為罷黜「非伊斯蘭」的民族國家體系、建立全球伊斯蘭共同體的第一步。

伊斯蘭國領導人同樣相信，他們的基本教義適用於整個伊

斯蘭世界及外面的世界。例如2014年7月，巴格達迪聲稱伊斯蘭國總有一天將統一「高加索人、印度人、華人、敘利亞人、伊拉克人、葉門人、埃及人、馬格里布人(北非)、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以及澳大利亞人。」伊斯蘭國利用社群媒體向國外傳播訊息，並旋即以遠處的暴力行動自誇。這種訴諸全球通用的主張，構成該組織吸引國外人士的關鍵訴求，並且是他國政府視為警訊的原因之一。

革命與戰爭

局外人自然會憂慮革命國家可能欲試圖擴張。革命領導人通常自認，輸出革命運動是己身之責，亦是最佳存活之道，此觀點可見於伊斯蘭國的口號——「存續與擴張」。毫不令人意外地，革命國家的鄰國一般會考慮採取預防措施，以削弱或推翻新政權，結果造成猜忌日深，並增加發生戰爭的風險。

革命政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衝突，會隨著雙方混合了不安與自負——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情結而進一步加劇。新的革命領導人自知其地位仍立足未穩，敵

人可能虎視眈眈，試圖在其鞏固權力之前予以推翻。與此同時，他們那難以置信的成功，伴隨著樂觀的世界觀，使渠等相信可以突破困境，以小搏大。在鄰國，同樣問題的結果則往往相反：它們通常對新國家的極端目標有所警覺，但自信能在其鞏固勢力前加以解決。

問題出自革命製造極大的不確定性，還助長了誤判。一方面，局外人往往極少和新政權直接接觸，故無法判斷其真正的企圖與決心，或明確知道其底線。例如，極少外界人士曾與伊斯蘭國高層會面，故其真正企圖與實踐決心仍神秘難解。

判斷革命國家的戰力亦非易事，尤其當社會基礎截然不同時。奧地利與普魯士認為法國境內發生革命使其軍力衰弱，然而民族主義熱情與大量徵召壯丁——惡名昭彰的全國總動員——使法國很快成為歐洲強權。伊拉克的海珊誤判伊朗在當時的政權垮臺後將不堪一擊，但當海珊麾下部隊於1980年入侵伊朗時，後者政教合一的政權卻動員革命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等新軍事力量，



使戰情轉為對伊朗有利。

革命是否會蔓延，亦不得而知，但對革命的恐懼通常情有可原。革命國家的抱負難免會引起國外的共鳴，並使部分的國外支持者加入渠等陣營。1790年代，歐洲各地的反君主政體聯盟齊聚巴黎，而西方人士，諸如曾在哈佛大學接受教育的社會激進分子里德(John Reed)則前往俄羅斯，追隨布爾什維克革命。此類迴響強化了對革命蔓延的恐懼：倫敦至莫斯科的歐洲人士擔心法國大革命會顛覆歐洲各地的王朝，正如同歐美人士對1917年後布爾什維克黨的擴散憂心忡忡一般，其他敏銳人士則於1950年代屈服於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使情況更為棘手的是，革命造成競相逃離新政權統治的難民潮。這些流亡者希冀說服國外勢力協助他們返鄉，因而往往對新政權的罪行加油添醋(儘管這些可能都是事實)，同時聲稱新政權不堪一擊。法國、俄羅斯、中共、古巴、伊朗及尼加拉瓜的流亡者便以這種方式控訴新政權，俾使國外勢力干預母國，但聽從其言的外國政府卻往往悔不當初。

諷刺的是，伴隨大多數革命而來的不確定性，有時卻有助新政權存活。由於外國勢力無法確知革命的威力或號召力，故無法輕易決定下列何者屬於較大威脅：是革命本身呢？抑或是其他敵對陣營利用情勢混亂之際改善自身處境？法國大革命得以成功，部分原因是反君主政體者相互猜忌，且其最初對奪取領土的興趣大於路易十六的復辟。同樣地，主要勢力之間的分化，以及對布爾什維克長期企圖的不確定性，阻礙各界對俄羅斯

革命做出共同的因應之道，而有助於列寧及其追隨者在1917年後保有政權。

然而，與革命者所冀，還有其敵人所懼相反的，係大多數革命造成的後果既非迅速擴張的革命狂潮，亦非立即的反革命政變。較典型的結果是新政權與各派對峙傾軋不休，直到革命政府被推翻，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Sandinistas)民族解放陣線，或者直到該國修正革命目標為止，例如蘇聯、中共及伊朗最後選擇的走向。

這些複雜的動態在現今的伊斯蘭國亦俯拾皆是。伊斯蘭國領導人將外界視為懷有敵意的異端，相信敵人注定毀滅，並視其小勝為勢不可擋的跨國起義開端，最後終將肅清現存國家。伊斯蘭國已證實具有驚人的能力，可在領土內提供安全保障與基本服務，在網路上傳播訊息，於陸上打擊孱弱的敵人。與此同時，它吸引數千名外國戰士加入陣營的能力，已引起各界關切其更廣泛訴求，以及煽動他國遂行暴力攻擊的潛力。逃離伊斯蘭國魔掌的難民證詞已深化這些恐懼，並強化敵對陣營在伊斯蘭國壯大之前需加以摧毀的主張。

與此同時，如同先前的革命運動，打擊伊斯蘭國舉措已因敵對陣營在優先順序上的衝突而減弱。美國與伊朗皆有意終結伊斯蘭國，但沒有任何國家願意協助他國取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土耳其亦將伊斯蘭國視為威脅，但它憎恨敘利亞阿薩德(Assad)政權，並反對任何可能強化庫德族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動。沙烏地阿拉伯認為伊斯蘭國的基本教義意識形態對自身正統性構成挑戰，但卻畏懼伊朗與什葉派之影響力。結果，沒有任何

一個國家將剷除伊斯蘭國視為首要任務。

雖然訴諸暴力並強徵性奴隸，但有關伊斯蘭國的一切其實了無新意。它的基本特質與影響力和其他革命國家的先例並無二致。我們對此已屢見不鮮，但該如何終止它？

革命不會散播

革命可透過其中一種方式散播。強大的革命國家依賴佔領行動：1790年代，法國對歐洲各地的君主政體發動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併吞東歐。然而，弱小的革命國家只能成為他國的前車之鑑。北韓金氏政權、古巴卡斯楚政權、衣索比亞軍政府、柬埔寨紅色高棉組織，以及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等，均缺乏以武力散播革命所需的原始力量。

伊斯蘭國亦然。蘇聯得力於強大的紅軍，得以在東歐施行共產主義，但根據美國軍事情報，伊斯蘭國僅有約3萬名可靠部隊，且無兵力投射能力。儘管憂心人士警告，伊斯蘭國目前控制的土地面積已大於英國，但大部分是空曠的沙漠。伊斯

蘭國領土每年生產的商品與服務介於40億至80億美元，其國內生產毛額與巴貝多(Barbados)不相上下。伊斯蘭國年歲收大約只有5億美元，約為哈佛大學年度預算的十分之一，且正在縮減當中。伊斯蘭國絕對稱不上強權；基於人口稀少、經濟落後，它永遠不可能成為強權。

再者，伊斯蘭國是否有能力征服弱小的鄰國，如約旦、伊拉克庫爾德斯坦(Iraqi Kurdistan)、敘利亞其餘領土、甚或是沙烏地阿拉伯部分地區？這絕對不可能，因為伊斯蘭國無論何時試圖將勢力伸出其發源地——無人治理的遜尼派地區時，皆遭遇日益增長的抵抗勢力。萬一伊斯蘭國大幅擴張，勢將招致強鄰加強聯手抵抗的力道。伊斯蘭國已促使他國加速採取圍堵行動，最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近期決定關閉南部邊界，在敘利亞北方設立緩衝區，並允許美國飛機利用印吉利克空軍基地(Incirlik Air Base)遂行轟炸伊拉克與敘利亞任務。吾人大可言之鑿鑿主張，伊斯蘭國不可能佔領中東實質領土，遑論中東以外的任何地區。

伊斯蘭國亦不致於透過蔓延散播勢力。推翻孱弱的政府已非易事，何況革命運動極少成功。藉由兩次世界大戰，馬克思主義者方能在俄羅斯和中共掌權，況且伊斯蘭國的成功僅是得力於天時：美國愚蠢進軍伊拉克、伊拉克總理馬利基(Nouri al-Maliki)採用導致分裂的方式治國，以及敘利亞的內戰。一旦缺乏這些好運，伊斯蘭國難以在其他地區複製其崛起的經驗。

透過蔓延散播革命亦有賴大量資源，這唯有強權方能擁有。蘇聯因為夠強大，所以能資助「共產國際」，扶植世界各地的附庸國，但中型革命勢力並非如此幸運。伊朗過去30多年來已援助若干附庸勢力，卻猶未能成功扶植一個傀儡國家。伊斯蘭國遠較伊朗弱小，受到其鼓舞的任何國外附庸，只能依賴自身資源取得成功。

此外，成功的革命乃鄰國的警鐘，促其採取步驟防止舊事重演。1917年之後，歐洲國家致力鎮壓可疑的革命分子，化解勞工階級的疑慮，以圍堵境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威脅；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亦於歐亞地區採行此道，其實施「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並透過北約及其亞洲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伊朗、波斯灣君主國家及其他穆斯林政府已致力圍堵伊斯蘭國之影響力，它們限制伊斯蘭國飛機進出，阻礙伊斯蘭國籌措資金，鼓勵當地宗教權威挑戰伊斯蘭國

的教義。歐洲與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社群亦忙於反制伊斯蘭國的有害訊息。

儘管採取這些舉措，但有些人仍會屈服於伊斯蘭國的誘惑，即使是10萬名外籍戰士也不可能將權力平衡轉為對伊斯蘭國有利。全球逾十億回教徒中，僅有一小部分人有興趣順服伊斯蘭國的殘



暴教義；許多目前急於加入伊斯蘭國陣營者終將幻滅且試圖逃離，或遭孤立於一個無法向外引起禍端的內陸國家。

不可諱言，部分外籍戰士已返回母國採取恐怖行動；受到

伊斯蘭國宣傳所煽動的外籍人士亦在數個國家發動「孤狼式」(lone wolf)攻擊。此類偶發事件不會銷聲匿跡，但其數量與規模仍不足以顛覆政府。據《紐約時報》報導，自2014年9月以來，與伊斯蘭國有關的組織或個人已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以外地區殺害約600人，這與同時期逾1萬4,000人在美國遇害相較，可說是小巫見大巫。這些死亡雖然遺憾，但相對小規模的暴力倒不致於擴張伊斯蘭國之影響力。

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亦侷限了其擴張能力。儘管伊斯蘭國領導人相信其對新「哈里發」願景是不可抗拒的，但這不可能贏得足夠的民心。美國和法國大革命體現的自由與平等理想，在世界各地引起迴響；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烏托邦願景吸引了數百萬農工。反之，伊斯蘭國清教徒般的教義與暴力行動並不實際，其不斷擴充的哈里發藍圖也與中東各地強大的國家、宗派與部族意識形態相互衝突。使用Twitter、YouTube或Instagram，不會使大多數穆斯林更加接受伊斯蘭國的核心訊

息，尤其是當其新鮮感盡失、潛在支持者知悉伊斯蘭國的生活真相之後。無論如何，絕大多數穆斯林深惡痛絕的回教派系絕不可能贏得非穆斯林的支持。然缺乏普世訴求的革命信條，亦將難以打擊伊斯蘭國粗糙狹隘的世界觀。

最後，若一個類似的回教國家運動企圖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以外地區奪權——這可能發生於利比亞局勢動盪之際——則該組織領導人將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會對巴格達迪言聽計從。外界往往將激進團體視為牢不可破的實體，特別是在過於嚴肅看待這些革命分子的措辭時，但眾所周知，這些運動極易起內訌。嚴重的分裂分化了吉戎第派(Girondins)和雅各賓派(Jacobins)、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Mensheviks)、史達林派和托洛斯基派(Trotskyites)，以及赫魯雪夫(Khrushchev)和毛澤東。伊斯蘭國傾向於將異議聲浪視為應處以死刑的異端，反而使此類內鬥的發生成為必然。事實上，這已使伊斯蘭國、蓋達組織及其他激進組織爆發嚴重爭端。

法國查理週刊遭到恐怖攻擊後，民眾高舉「我是查理」的海報上街聲援。(Source: AP/達志)





批評家可能認為這項評估過度樂觀。他們可能辯稱，鄰國比一般外界認為的更加脆弱，且伊斯蘭國的例子可能動搖沙國王室、約旦哈希米王國或埃及軍事獨裁政權的基礎。鑒於中東秩序不穩，以及普遍的不滿所引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伊斯蘭國是否可能成為革命極少擴散法則的例外？

或許有可能，但這最糟的情況發生率微乎其微。若激進分子如此容易便能顛覆外國政府，則早就有更多先例可循。當前各國政府毋須特別有能力抵擋革命，況且伊斯蘭國的潛在敵對目標擁有充裕的資金、有組織的維安部隊、具影響力的宗教權威支持，以及同仇敵愾的國外支持者擁護。基於這些理由，伊斯蘭國之崛起並非預示一場革命狂潮的開端。

伺機而動

伊斯蘭國的長期目標注定失敗，然而，這並不意謂剷除它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事實上，以歷史為鏡可以得知，試圖以軍事力量消滅之，會輕易造成反效果。奧地利和普魯士等外來勢力的干預，激化了法國大革命；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使柯梅尼及其追隨者得以肅清伊朗溫和派組織。列寧、史達林及毛澤東利用外來威脅，動員支援並鞏固權力，俄羅斯與中共的革命皆歷劫猶存。同樣地，摧毀伊斯蘭國的強勢行動可能反而助長其存活，尤其是由美國當領頭羊時。

這使耐心圍堵成為最佳策略。隨著時間過去，這股革命運動可能因自身暴行與內訌而瓦解。這樣的結果當然眾所樂見，但卻無法保證會是這樣

的結局。幸運的是，歷史經驗顯示，若伊斯蘭國存活下來，將隨著時間流逝而成為一個較正常的國家。革命分子尚未掌權時，大可幻想改變世界，但長時間存活後，他們必須學習與理想妥協並修正行為，即使渠等並未澈底放棄最初原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世界革命」夢想讓位給了列寧的「一國社會主義」；毛澤東的內部激進政策伴隨著對他國的避險政策。伊朗亦遵循類似軌道，以最審慎之道採行外交政策。最終世界上其他國家——甚至包括美國——將與這些革命國家妥協。

正常化當然並非自動發生，革命國家不會軟化其作為，除非其他國家使其明瞭不間斷的極端主義代價高昂且具反效果。這意謂在可見的未來必須圍堵伊斯蘭國，直到其修正革命目標或甚至完全放棄為止。

為達此目的，圍堵政策必須防止伊斯蘭國佔領他國及對這些國家灌輸激進的願景。由於伊斯蘭國勢力衰弱但核心訊息如此侵蝕人心，故防止其進一步擴張的舉措不應超出前線國家的能力，況且其中大多數國家自顧不暇，美國則僅應提供適度援助。庫德族、伊拉克什葉派、伊朗、土耳其、約旦、波灣君主國家及以色列不應對伊斯蘭國的坐大作壁上觀，任何的小勝利都能鼓舞這些鄰國更加積極制衡伊斯蘭國。

華府應提供情報、武器及軍事訓練，援助這些圍堵作為，但應儘量縮小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使遏阻伊斯蘭國的行動明顯由當地部隊主導。美國空中武力應僅用來防止伊斯蘭國擴張；若試圖轟炸至伊斯蘭國投降，將難免傷及無辜民眾，強化反美情緒，提高伊斯蘭國的人氣。

區域勢力無疑會試圖推卸責任，使美國為其戰鬥。美國領導人應委婉拒絕這些伎倆，堅定地回絕此問題。伊斯蘭國對美國、對中東能源供給、對以色列、或對任何其他美國重大利益皆非生存威脅，故美軍毋須涉險打擊之。

欲成功圍堵伊斯蘭國，亦有賴中東國家加強隔離伊斯蘭國的革命訊息。這些政府可藉由下列舉措，降低人民受到伊斯蘭國感召的風險：採取追蹤並逮捕潛在支持者及阻斷金援等強力反恐措施，以及解決國內的腐敗——這使伊斯蘭國成為具有吸引力的替代選項。鄰國具有聲望的穆斯林權威人士應提醒教徒，回教文明是在最具包容力時達到全盛期，而非在專斷獨行或排除異己的時候。為剷除伊斯蘭國在當地受到的支持，華府應繼續敦促巴格達什葉派政府對遜尼派採取更具包容性的政策。

美國應私下鼓勵並公開支持這些舉措，同時持續不斷地建議當地政府如何治理國家。近期美國主導中東政局之舉已招致一連串令人難堪的失敗，美國

領導人如今應適度提供建議。華府亦可鼓勵歐洲盟友加強整合各自的穆斯林少數族群，但此任務最終仍操之在渠等手中。

誠然，美國決策者應謹記，美國對圍堵伊斯蘭國涉入愈深，愈會深化伊斯蘭國對西方十字軍及其回教異端盟友的惡意宣傳。以宗派觀點而言，若美國採取另一項所費不貲的作為，重建伊拉克安全部隊，則將看似與反遜尼派政策同聲一氣——這正是使伊斯蘭國受到歡迎的政策——從而鼓勵伊拉克遜尼派與東敘利亞繼續效忠伊斯蘭國。

由美國所領導的反伊斯蘭國行動亦具有強化伊斯蘭國訴求的風險：若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持續堅稱伊斯蘭國是重大威脅，則後者乃伊斯蘭教最忠實捍衛者的主張便成為可信。美國決策者宜將伊斯蘭國視為僅需適度關注的次要問題，而非大肆宣傳此一威脅並強化伊斯蘭國自身的宣傳口號。

美國帶頭抵抗伊斯蘭國，亦會鼓勵身陷險境的當地勢力趁勢搭順風車。抵禦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最佳之道是改善中東各地的治理方式，但若當地政

府相信華府會不顧一切保護它們，則此一困難的進程甚至根本不會開始。美國做得愈多，當地勢力愈缺乏自立自強的誘因。

簡言之，若美國拒絕承擔重任，則圍堵伊斯蘭國更可能成功。此一不干預之道有賴美國領導人面對斬首、恐怖攻擊、破壞古蹟及其他挑釁行動時，依然保持冷靜。在這個政黨政治及24小時有線新聞的時代，維持前述紀律並非易事，況且這違背了美國多數外交政策機構的干涉主義本能。

然而，並非每一項他國悲劇都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並非每一道難題都需仰賴美國力量加以解決。美國以入侵伊拉克回應九一一事件實鑄下大錯，這正中賓拉登下懷，而伊斯蘭國無疑亦歡迎美國盲目干預中東事務。重蹈覆轍將會比犯下罪行來得更加嚴重。

作者簡介

Stephen M. Walt現為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國際事務羅伯特和勒妮·貝爾弗(Robert and Renée Belfer)教授。

Copyright © 2015,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